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加快数实深度融合 赋能高质量发展

刘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强调了构建和完善促进两大经济形态深度融合制度的重要性,明确了数实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关键路径,彰显了党中央对以数实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本质是将新一代数字技术应用于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为底座支撑,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以数据要素为关键赋能,以数字生态治理为重要手段,以数字人才为智力保障,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实体经济要素结构、生产方式、组织模式实现根本性变革,重塑经济发展动力,优化经济发展模式、拓展经济发展业态,激发经济持续增长新动能。

浙江省作为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全国第一的省份,率先在全国提出推动全域性数字化改革,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数实融合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浙江数字经济规模超过4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50%,产业数字化指数连续四年居全国第一。推动数实深度融合赋能系统发展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聚焦数字基础设施、核心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流通、数字生态治理和数字人才战略五个方面,探索有效路径来挖掘并释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潜能和价值,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要提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级,筑牢“融”的基础底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撑数实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一方面,要促进新型基础设施智能化创新发展,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实现智能控制、运营优化和生产变革,推动实体经济智能化转型和创新发展,激发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依托移动物联网和工业互

联网,加快构建综合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促进实体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优化,推动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算力强省”建设,落实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着力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普及应用。同时,以之江实验室智算算力中心及宁波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等为基础,在全省范围合理布局“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算算力”全覆盖、多维度、高质量的算力体系,打造多层次算力供给能力,构建算力资源高效调度与供给的网络体系,大力拓展算力的应用场景与产业化路径,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关乎国计民生关键领域应用的算力扶持力度,为深入推进数实融合提供多层次算力支撑。

二要加强核心数字技术攻关研发,激发“融”的创新源泉。数字技术创新不仅是促进数字经济升级迭变的助推器,也是增强数实融合发展韧性的核心驱动力。应坚持自主创新道路,将数字技术的原创性、引领性作为第一要务,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产学研用深度合作,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科技企业等,加大研发投入和步伐,集中优质资源开展5G/6G、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关键元器件等核心技术的攻关,形成重大科研成果,牢牢掌握数字技术发展主动权,从根本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水平,打造数字经济竞争新优势,推动数实融合向更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以应用为牵引,加强分类指导、分业施策,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激发企业作为数字技术创新主体的活力与潜力,加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技术服务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引领行业潮流的数字经济创新平台,创建一批数实融合的新型载体,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千行百业的深度渗透与广泛应用;围绕诸如碳基芯片、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可能出现颠覆

性创新的细分领域,加强大数据技术的分析预测和决策支持功能,尽早开展预研并推动示范性应用,持续提升浙江省核心技术创新效能,弥补数实融合发展中的技术缺口,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先机。

三要促进数据要素安全高效流通,提升“融”的广度深度。数据的深度挖掘、广泛应用与合理流通,不仅是释放数据要素潜在价值、加速数实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更是优化经济结构、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积极提升公共数据的开放和开发利用水平,提高政府的数据供给能力,促进政府与各类经济组织的数据协同共享,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共享管理制度,充分挖掘公共数据的潜在价值;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制定统一的行业技术标准、市场规则、交易制度和利益分配机制,促进数据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通;深入实施“数据要素×”行动,强化各个领域的场景需求牵引,促进数据要素高效合规供给、流通和开发利用,推动多源数据融合、数据多场景应用和多主体复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形成数据要素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循环链条,整合数据要素的供给方、需求方、交易平台与中介咨询服务商,打造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推动数据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深度融合,提升整体生产效率与服务品质,以数据要素推动价值链、创新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发展,释放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乘数效应和倍增效应。

四要构建现代数字治理与服务体系,营造“融”的良好生态。数字治理和监管能力的提升是确保数实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推动发展和监管有效协同,对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数字治理体系,创新治理理念与方法,进一步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与立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坚持创新发展与常态化监管的动态平衡,树立以高水平治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的理

念,促进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同时,重构监管边界,建立新的治理规则和制度,不断提升监管的技术手段和模式,实现事前事后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实现发展和治理的融合推进。另一方面,应积极拓展数字政府服务的新场景。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调控作用,全面推进技术、业务和数据的融合应用和共享开放,深化“一网统管”和“一网通办”融合,建立与业务职能相匹配的数据矩阵,实现对重点领域和高频事项的全面映射,企业和群众办事的精准匹配,为群众提供公平高效的公共服务,确保数字政府服务“最后一公里”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形成数实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

五要优化数字人才战略布局,提供“融”的智力保障。人才是数实融合的第一资源,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优化数实融合发展需求的人才战略布局,能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保障。推动产学研合作,在高校增设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强化课程设置,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鼓励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实训基地,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产学研用一体化人才培养项目,促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跨界融合,培养高标准、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优化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投入,综合运用补贴、保险、产业投资基金等多种政策手段,引入国内外优秀教师和专家,建立人才培养基地,提供前沿的技术和知识培训,同时,支持数实融合方面的创新创业,除了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建立孵化器、加速器等创业支持机构外,更需要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激发动力活力,为数字人才创新创业打造数字生态圈,广泛吸引各类数实融合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作者为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做强生产性服务业 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胡彩娟 余雯娟

专家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同时要求“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如何利用我国人才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及区位优势,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生产力水平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关键在于发挥好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用,这是当前亟须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实现高水平生产要素聚合的关键动力

生产性服务业是依赖新技术和新模式的产业高端化产物,具有知识密集、附加值高、融合性和专业化强等显著特点,涵盖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与商务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金融服务与管理以及生产性支持服务等多领域内容,其本质是通过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发挥综合优势,成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源。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促成“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进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迅猛发展的新经济时代,数智技术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最重要生产工具之一。而生产性服务的主要手段正是数智技术,即充分利用数据、技术要素及其相应的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成果,在资本、管理等要素加持下,实现更高水平的要素配置,逐步推进拥有更高综合素质的新时代劳动者、数智化的劳动资

料,以数据信息为主的新型劳动对象实现高水平交互融合。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将上述多要素高水平聚合发展,从而实现更高科技含量和综合水平的服务提升,助力各大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专业化服务提升三次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全要素生产效率,并根植于三产融合,裂变催生出一系列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

随着社会分工愈发明确,工业化发展从劳动密集型走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传统生产性服务业逐步被推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并进入三产业进入高级互动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三次产业互动融合、互为供需,在制造业中尤为显著。从产业演变看,随着制造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适应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和专业分工细化的趋势,制造业企业不得不将研发、设计等一系列生产性服务活动进行垂直分解,外部化实施,从而催生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从产业关联与波及效应看,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制约或促进制造业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因素;从产业分工视角看,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将带来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其规模化水平的提高则带来制造业运营成本下降。“制造+服务”双轮驱动已是成熟的产业发展战略,即以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支点,撬动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迭代升级。研发破局、科技赋能、设计增值、金融输血……生产性服务业已然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哪怕部分

价值被涵盖于制造业产品价格中,其发展内涵与战略价值仍远高于统计数据。

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路径

如何科学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究其根本,生产性服务业脱胎于产业发展,天然糅合着三次产业蝶变需求。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抓手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融合发展,有利于培育经济新动能,尤其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转型,也有利于壮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实质是加速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从而形成高效能生产力载体和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当前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以“高质量”和“融合式”为主旋律,以数字化、融合化、国际化和品牌化为目标,以优质企业、优质科创平台两大“牛鼻子”为抓手,以平台基础夯实、重大项目引领、企业活力激发、高端人才引进为路径,以信息科技、高端商务服务为重点,大力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一是需求导向与引领。以三次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集群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定需求和前瞻性需求预判,着力加强服务业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注重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嵌入应用,催生新产业、新动能,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内核的服务经济体系。

二是路径选择与抓手。以培育大企业、构建服务链、促进集群化为重中之重,加大招引引高能级产业链发展项目,培育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各业态渗透交融,实现专业化服务的有效集聚;结合发展信息服务、高端商务服务、研

发设计等产业,更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原研平台与能力。以高能级专业化平台建设为核心,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的原研能力。大力招引、培育战略科学家和高水平人才,加快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原则上实现“一集群一平台”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技术发展。

四是制度完善与供给。以突破性技术、全新领域与赛道、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为基本特征的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地需要新制度支撑与助力,这是“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应有之义。其中不仅涉及政府内部的事权责任主体明确、部门关系理顺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面向市场主体的资源配置(包括生产要素、财政、金融政策与奖补举措等)制度、产权制度等的完善与供给。

五是生产关系迭代与保障。以科技融合、产业创新及两者高水平深度融合引领的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必须有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做保障。诸如企业更新迭代、传统产业转型需要敏锐而又极富创新动能的企业和企业家,又如新产业、新模式亟需注重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体系、金融支持体系联动的整体优良营商环境……因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打造创新驱动型营商环境,实施高水平开放战略等是当前完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内涵,并基于此形成动态化的生态体系,从而保障“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之江智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镇化率是衡量城乡二元结构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国家统计局9月23日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5个百分点。75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1949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29个,城市人口共3949万人。2023年末,全国城市个数达到694个,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达到67313万人。其中,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29个,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11个。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不仅推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也重塑了城乡关系。了解中国城镇化过程何以发生以及下一步趋势,是弄懂城乡融合发展目标要义的关键。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是人基于效率选择的结果,包括三个底层动力机制:一是更多就业机会驱动大量富余青壮年农业劳动力从乡村转向城镇。二是城镇化高于乡村的收入级差,驱动人口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非农业领域。三是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和品质、土地级差以及以住宅为代表的资产价值之间的财富差别,是城镇化后期驱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重要原因。这三个动力机制的主要机理是在效率和利益驱动下发生的劳动力流动选择。城镇化率不断提高是我国城乡不平衡初始条件下效率驱动的结果,同时也带来我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巨大变迁。

其次,不同地区城镇化率提高的差异性是入基于要素禀赋和现有政策用“脚”投票的结果。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用系统观念去辩证分析。城镇化率也因地而异。不结合其他发展性、均衡性指标,是不能准确度量城镇化所处阶段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城镇化率是个矢量指标,有价值流向,但在城镇化进入中后期时,各地因为城市规模大小、产业资源丰富度而产生分化,人口流向复杂,须从多因素考量城镇化全局效率。

因此,应至少综合四方面去判断城镇化率是否还有提高空间:一是人口城镇化,无论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规模效益,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值又能较好反映职住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收缩状态。二是经济城镇化,主要应该从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城镇经济密度等关乎就业岗位创造的指标去观察。三是社会城镇化,可以通过农村居民收入与人均GDP比值来观察,比值提高放缓,城镇化速度也就慢下来了,说明人口转移对效率提升作用减少。四是城乡一体化,如城乡居民收入比越大动力越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率越高,人口向城镇流动的动力就小了。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要求,经过5年努力,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今后,我们应把更多考量放在城镇化效率与质量的提升上。

最后,未来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与国际经验有较大区别,除经济空间格局演变之外,政策和制度建构方向将是影响人口迁徙转移的最关键变量。中国城镇化变化趋势已很难用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对照,基于对我国国情的观察,未来五大趋势可见:一是迄今为止我们仍处在经济结构快速变迁期,城乡结构深度演化还在继续。二是跨区域人口流动仍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发生,东部沿海相当一部分区域城镇化率还会提高。三是许多都市区极化还未完成,产业集聚导致人口集聚的逻辑仍然存在。四是县域正在进入新一轮洗牌,有些趋于收缩,有些精明增长,少数地区在扩张,县域地区信息化、高铁网络时代发生重大分化。五是县城及大都市区广大农村地区有可能成为新产业新业态的生态空间,高素质人口向农村流动将成为可能,这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逆城市化。

综上所述,能不能真正以人为本引导人口流动转移,关系着城乡融合格局的形成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行动计划》明确,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我们要把握好适应城镇化演变规律的制度改革方向。一是在尊重城镇发展自发演化和人口自由迁徙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建构,把改革重心放在推动更大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要素跨区域跨城乡自由流动上。二是因地制宜,把提高经济密度放在提高城镇化效率的重要位置。要允许资源向优势地区、规模城市相对集聚,城市群(大都市)依然是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我们要一手抓大都市的有序极化,一手抓城乡融合的县城城镇高效集聚,加快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三是加快突破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壁垒。城镇化难点在农村,城镇化发展红利也应该分享到农村。农村生产空间并不是只能发展农业,要加大城乡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力度,为其他适宜在农村集聚的产业创造要素集聚条件,为先进要素流入农村、实现农村人口现代化打开制度通道。

【作者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实践探索

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

吴剑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都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方式。龙游县政协锚定“社区”这一社会治理最小单元,以全县体量最大的融合型社区河西街社区为试点,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助力解决“村社混居、环境脏乱、人口结构复杂、群众诉求多元”等现实难题,取得突破性成效。

全过程党建统领,精准把握衔接“尺度”。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关键是坚持党建统领,把党的领导贯穿协商议事全过程各环节。一是构建“1+2+N”组织共推机制。“1”即以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为指引,做好协商延伸社区各项工作;“2”指1名县政协班子成员牵头领衔、1个专委会具体落实;“N”为若干名政协委员动态参与,形成政协组织搭台、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二是完善“1+5+N”协商共议机制。“1”即社区党委班子;“5”是五类固定成员,包括乡镇(街道)联络组、村(居)民委员会、小区党组织、小区楼道长、网格员;“N”包括协商事项利益代表、政府职能部门以及业内专家等。依托社区“协商驿站”,至今已开展“例会协商”40次,现场解决问题34个。三是探索“六共融合”村社共治机制。指导社区以“大党委”制打通挂联部门、辖区单位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壁垒,探索建立村社组织共建、事务共商、力量共用、服务共享、活动共办、责任共担的“六共融合”机制,办好老街微改造、消防千道扩建、雨污管道和路面修补等8件群众“急难愁盼”事。

全方位下沉服务,延伸拓展衔接“广度”。“开门就是基层、出门就是群众”是基层政协的先天优势,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题中之义是推动协商平台和委员履职“双下沉”。一是协商平台“引进来”。统筹“民生议

事堂”“协商驿站”“委员工作室”“社情民意联系点”等平台的同时,积极融入“龙游通”“掌上政协”“履职小管家”等场景,“线下+线上”拓广度。二是委员履职“沉下去”。发动委员开展多形式走访、调研和联系服务群众。面对社区成立时无党群服务中心的难题,政协委员会同街道村社、相关部门发起协商会,确定租用城中村村物业楼方案,打造集党建、志愿服务、学习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三是为民服务“联起来”。针对社区老年人和学龄儿童“两头多”情况,政协“一老一小”委员工作室主动作为,牵头打造服务共同体,吸纳入驻站阅览室、星火工作室等社会组织6家,搭建老幼互融服务场景9处,开展养老助老、爱心托班等实践活动200余场,覆盖人群超5000人次。

闭环转化落实,持续提升衔接“效用”。做好政协协商延伸基层“后半篇”文章,闭环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地。一是强化资源整合。不建机构建机制,用好用活协商民主机制,将停车位增加、物管费收缴、适老化改造等“关键小事”纳入协商范围,统筹委员、联络组、企业、村社等多方力量,导入多元资源共同解决。二是强化回访督办。协商形成的重要意见建议,由县政协农业和农村委负责督办,同时将“回头看”作为机制固化下来。今年5月,县政协牵头再聚“民生议事堂”,围绕强社公司可持续运营开展协商,既是上轮协商内容的迭代深化,也是对协商成果转化的回访检验,取得了良好效果。三是强化宣传造势。引导社区先协商后决策,营造“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的协商氛围。发挥传统媒体及网站、公众号、委员群等阵地作用,多形式多维度开展宣传,让更多人关注、参与、支持社区协商议事。

【作者为龙游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重要窗口 理论周刊·知行

以人为本提升城镇化效率与质量

潘毅刚